

战后世界经济的 转换

[日]久保新一
张玉新 王翠莉
张 君 井如鹏
李文光

著
译
审校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173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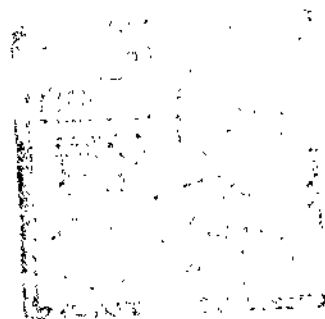
战后世界经济的转换

〔日〕久保新一 著

张玉新 王翠莉 译

张 君 井如鹏

李文光 审校



南开大学出版社

战后世界经济的转换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第四印刷厂印刷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72千

印数: 1-2000

ISBN 7-310-00914-2

F·117 定价: 12.80元

译 版 序

薛敬孝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久保新一教授的力作《战后世界经济的转换》的中译本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它将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帮助读者去分析和理解战后世界经济所经历的深刻变化，给我们以重要启迪。

战后世界经济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东亚的兴起。这正是久保教授所讲的亚洲化和 NIES 化。7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明星，即使在 90 年代初各工业化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萧条而使世界经济呈现微弱的增势时，东亚地区依然以高增长著称，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久保新一教授在《战后世界经济的转换》一书中，是以 NIES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对 NIES 的研究又是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同时，他以微电子化为线索展开对全书的论述。他把学术界关于 NIES 论的研究概括为国际经济论研究和国民经济论研究两个潮流。他指出，尽管两者都是在内因和外因统一的基础上研究 NIES 发展原因的，但前者侧重于外因，后者侧重于内因。统观全书可看出，久保教授是立足于国际大环境来剖析 NIES 的。

久保教授的分析从以下两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极好的启示：

第一，“四小”的起家源于微电子化（ME 化）。

久保教授认为,微电子化是20世纪科学革命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开端,也是生产力体系向研究与开发(R&D)占重要地位转换的过程。它本是60年代冷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缓和而由军用转向民用。微电子革命使生产自动化、信息网络化,进而使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化(System)、软化(Soft),使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0年代后半期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地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所谓NIES化就是指80年代展开的东亚NIES以ME制成品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NIES是以成为ME的生产基地而引起世界注目的。70年代,东亚和拉美及南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被称之为NICS。进入80年代后由于里根政府高利率政策的影响而使NICS分解为二部分。拉美一些国家因欠债过多而陷入债务危机,进而失掉了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东亚的“四小”却不同,因ME产业的发展而得到了持续高增长。美国的电气、电子工业原来基本是依靠本国自身生产零部件和原件的,80年代前半期由于高利率引起的美元升值使美国不得不走向从国外订购或委托生产零部件和原件。在这一转换过程中,ME产业的生产重心便由美国转移到东亚。美国的ME产业的生产重心之所以转移到东亚而不是其它地方,其原因在于:第一,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当时正处于美国与苏联、中国对峙的冷战体制的最前线,美国除了对这一地区进行各种援助外,还通过各种渠道,从经济上促成这一地区的发展;第二,这一地区拥有素质好、价格便宜、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特别适合ME产业发展的要求,等等。80年代初期,由于“四小”受到“三低”(低汇率、低利率、低油价)的恩惠,出现了空前的出口高潮;1988年,NICS的称呼由NIES代替。久保新一教授认为,东亚NIES形成的基础在于ME生产重心从美国向东亚的转移。

第二,东亚的兴隆是冷战解体的产物。

久保教授认为 ME 革命和 ME 生产重心向东亚转移的过程，并不是东亚 NIES 自身的产物，而是战后冷战体制解体的力学的产物，他把冷战体制解体区分为二个阶段。

战后冷战的压力导致了 60 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困境，为了解脱滞胀局面，尼克松政府在 1969 年采取了缓和路线，决定从二个半战争战略转换为 1 个半战争战略，由此而开始缩减军备。这一转变和 1971 年美国的新经济政策决定了美元和黄金停止兑换，形成了冷战解体的第一阶段。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力学结果有两个：其一是 ME 由军需向民需的解放。ME 产业天然就不适合于以短期高收益为目的的美国型资本主义，因为 ME 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从而制约着利润；而拥有优质劳动力且工资水平低的东亚地区自然成为 ME 产业的最适合的场所。其二是 IMF 体制解体和欧洲美元的产生。美元和黄金停止兑换导致了 IMF 体制解体，同时美元急剧贬值又引发了原油价格暴涨，大量欧洲美元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推进了中南美、东亚、南欧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说，冷战体制解体的第一阶段的力学结果是以 ME 革命和欧洲美元膨胀为媒介而产生出了东亚 NICS。

1979 年以伊朗革命为转机，美国又从缓和走向了新冷战，与此同时是里根供应学派的登台，其结果是高利息、高汇率导致了美国产业空心化，以及 ME 生产基地的向东亚转移。

1985 年由于美国转化为债务国，从而迎来了冷战体制解体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外汇调整，即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四小”的货币基本上与美元联动而同时对日元贬值，形势发展对“四小”出口极为有利。1986 年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转为赤字，赤字主要发生在与日本和“四小”的贸易中。1988 年美国对“四小”贸易赤字达到了新高度，1989 年美国停止给予“四小”的特惠关税，“四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 NIES 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它体现了世界经济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与

此同时，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冷战体制也告完全解体。

久保教授的上述思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东亚的发展提出了看法，其独到之处给予我们以重要启示。我认为久保教授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东亚地区的快速增长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热烈讨论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学者们列举出：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教育比较普及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等等，认为这是东亚地区高增长的原因。有的学者还特别强调了东亚地区的垂直分工和儒教文化。

笔者认为，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在分析其原因时应有所侧重。在这里研究对象既然是一个区域经济，就应该看到这一区域范围内本身的内容并且区别出与它有关的但属于其它范围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东亚快速增长的原因，可从三个层次上分析。第一层次是东亚所属国家（地区）能够迅速增长的各国（地区）的基础性条件；第二层次是把东亚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在这样一个国际单位中从总体上探求其促进增长的内在机制，以把握区域自身的主体性条件；第三层次是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总体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从而为这一地区增长造成的外在性条件。不难看出，我所说的东亚经济的研究属于第二层次，即东亚自身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形成的增长原因。当然，这一分析决不是孤立的，而应该也必然涉及到其它两个层次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国际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国内经济必然与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地区经济必然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第二层次上的问题也只有和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上的有关问题结合起来才能使分析更加透彻。

从东亚地区经济的内部联系出发来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要探求东亚地区总体高增长的内在机制。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产品周期理论或雁行理论。这一理论把产品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各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所处的阶段也不同，从而在各国之间形成了一雁行形态。这一理论经日本学者实证分析，认为从经验数据来看符合日本、“四小”、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被视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牵引车，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很明显，这种理论主要讲的是这一地区的垂直分工系统，可以说它更贴近 6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的现实。自 80 年代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雁行发展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第二种理论是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在讨论东亚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重视的是投资和技术的转移及其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进入 80 年代以来，不仅是日本，“四小”也在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向外投资。从而构成了投资源泉多元化的现象，这进而决定了东亚地区多发性增长源的出现。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水平分工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东亚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单纯的雁行形态，而成为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这种理论也称之为喷泉模式。应该说，这种理论依然是雁行理论的延续，只不过它强调的角度不同罢了。

第三种理论我把它称为整体咬合连动理论。进入 90 年代以来，不仅仅是多发的投资源泉促进了东亚的增长，而且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和东亚地区内部需求的增长也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不但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上的大市场。特别是 90 年代初期，发达国家相继陷入萧条，而中国却以两位数或

接近两位数的高速持续增长着。在此期间，“四小”不仅没有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同时步入萧条，反而仍以6—7%的速度呈现出一种繁荣局面。追其原因，中国在1992年和1993年的大量进口不能不说是“四小”市场萎缩的一个补充。再者，东亚地区自身的市场联系正在加强，即内部需求呈不断增长之势。1989年，日本、“四小”、东盟的进口商品总额比美国的进口额高出了10%。东亚地区市场的内部化促进了东亚地区整体增长因素的增加。因此，东亚经济增长出现了两种牵动力：一种是从商品供给角度来看，讲的是资本和技术；一种是从商品需求角度分析，讲的是市场需求。前者构成了投资推动型增长，后者形成了市场拉动型增长。这两种牵动力交织在一起，使东亚的增长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种整体联动的作用。

以上三种理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说是渐次扩大的，后者不是否定前者，而是包括了前者，它体现了时序发展的过程。这种论述只说明东亚地区增长的内在机制本身，而其它有关的问题，如国际环境和各国的具体条件等则被舍象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分析并不否认国际环境和各国具体事件的重要性，正如久保教授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一定条件下，国际环境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只是分析角度不同罢了。

久保教授在《战后世界经济转换》一书中还有很多论述是非常精彩的，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也是非常深刻的。因此，这本书的中文版问世，一定会给读者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厚的理论素养，更丰富的国际经济知识。

久保教授是我的老朋友，1981年至1983年期间我在日本作访问学者时和他相识。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虚心好学的学者，同时他也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位中国人的好朋友。1982年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中国有可能迅速发展。1987年和1989年他曾两度访问南开大学，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发展重

心将转向东亚。这一观点在《战后世界经济的转换》中得到了充分发挥。这次借为久保教授的译著写序之机，我不仅作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写下了一些读书心得，同时，我还发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所说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久保教授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1994年8月24日

于南开大学

中译版序言

久保新一

广岛亚运会上中国选手大显身手，引人注目。正好四年前，我在中国观看过亚运会，与那时相比，这次活跃的程度有了明显的质的提高。这是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飞跃相关联的。从60年代日本发展的时代开始，经过80年代东亚NIES的时代，终于迎来了90年代中国的时代。中国的参与，使东亚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的工厂”，并正欲给始于15世纪的以西洋为主导的时代打上休止符。

曾几何时，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流传起资本主义胜利的冷战后世界经济论。但那以后的世界经济的动向，正在逐渐表明那流传不过是一种虚构，资本主义也尚未胜利。1993年，美国摆脱了90年代的不景气，1994年世界经济也终于开始出现恢复景气的征兆。但是支撑这景气的基础，则是依靠了美国货币的循环，即运用由赤字国——美国通过被称为金融派生商品的纯粹的投机活动从世界收集“危险”资金，这在金融界是前所未有的。在实体方面，除欧美诸发达国家之外再加上日本、东亚NIES的过剩资本为谋求投资场所及市场而涌向中国，也就是说，是由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拖着走的，如此而已。

在本书中，我将80年代以后的日本与东亚NIES的经济飞跃以“ME化（微电子化）与亚洲化（作为80年代现象形态的NIES化）”的形式来表示。但90年代，ME化向着信息化阶段、亚洲化向着中国化阶段发展，各自正在转移着舞台。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这样跃进的话，那就过于乐观了吧。除已面临的通货膨

胀的忧虑之外，正因为是历史悠久、国土辽阔的大国，所以还会面临日本与东亚 NIES 所没有经历过的诸多困难及问题。比如能源、资源的限制与环境问题，内外的市场、销售问题，以及占人口总数 80% 的农业即农村问题等等。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中工业化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的分解，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战后的日本，二次大战刚结束时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50% 弱。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减少到 10% 多一点，但为要吸纳这些农业人口，就必须建立起同钢铁生产超过一亿吨的美国相当规模的重化学工业。即使这样，日本在进入工业化的 60 年代，在近邻中还没有工业国，自动化也没怎么发展。而如今周围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已经工业化，ME 化、自动化也相对发展了，工业的雇用吸收力与过去相比已降低很多。如果在开放体制下要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推进工业化的话，为确保产品的质量，就不得不使用最尖端的自动化机械。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在开放体制下推进工业化的难处。

中国政府在 1992 年的第十四届中国共产党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概念。这概念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冷战后的世界经济也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今举世都在赞美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但仅这些是不够的。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坂本和曾指出，如果想仅仅以自由及市场经济的原理来左右今后的世界经济，那么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占世界人口 10% 以上的人们就将面临饿死的命运。如果承认贫穷的 10% 的人们的生存权利，除引进社会主义的互助精神的原理以外则别无他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对于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不仅对未来是重要的，即使在过去，实际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主导战后日本经济的经济原理，已经众所周知，那并不是完全依靠了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它还通过政府的计划与管制，

由扶植产业的产业政策来补充完成。也就是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互相配合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东亚 NIES 也一样,虽然各自的重点不同,但是以市场与计划的混合经济的形式发展起来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式的经营及日本式的生产方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80年代东亚 NIES 又显露头角。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 ME (Micro Electronics——微电子学)新技术的出现及应用从而推进了自动化的所谓产业的再构筑的展开。为推进 ME、自动化,日本式的经营最合适。二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被称为日本式生产方式的新型生产方式。这新型生产方式通过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也传播到了东亚 NIES。

回顾近代工业化的历史,新的技术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生产方式,往往是在这种技术作为寻常事被接受并与支撑它的特定的劳动力基础相结合时才能开花结果。生产方式一经确立并普及以后,便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很快地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及地区。19世纪初的兰开夏棉布业,是植根于爱尔兰农村出身的劳动者,但在有了机械化大工业以后才得以确立。20世纪2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的传送带生产方式,是由第一次大战的战火中逃出来的中、东欧移民劳动者所支撑。80年代 ME 产业展开的中坚人物则是东亚农村出身的工人们。由于 ME 技术是需要精度以 μ (微米) 为单位的超精细加工,所以必须要有不同于传统重化学工业的劳动素质与周密的组织及管理,而由零散耕种稻田陶冶出的勤劳手巧的东亚工人担当了此项任务。

90年代 ME 技术趋向成熟,其生产方式一旦确立便结束了硬件作为主流的时代,而转向软件及系统化为主导的时代。与此同时,以硬件生产为主导发展起来的日本的时代也随之结束,擅长于系统化及软件开发的美国恢复了过去的地位,而硬件生产的基地开始移向中国。至于21世纪的信息化社会将是何种模式,虽然

现在还难以预测,但人们认为中国有着遍布于全世界的华人网络,信息化社会将以不同于美国的形式展开是十分可能的。

为了解除一些可能产生的误会,这里想就本书的特征作若干说明。第一是提出了美国与日本、东亚 NIES 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 ME 的生产最初是以国际间的相互关联结构为前提而成立的。第二,与这事也有关,即还没有习惯的外来语频频出现。不使用概念更成熟一点的词汇,明知会遭到批评,但仍用了很多外来语。这是因为 ME 技术本身还在发展中,尚未固定下来,再则战后的日本及东亚 NIES 的经济,开始时与美国有关,是在其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很明显地缺乏独立性。是为了表示这种关系与实际情况,而将原来的外来语搬来使用的。这一点如何传达给中国读者,我想会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习本书。一方面,日本和东亚 NIES 已是成功的事,中国也有可能成功。另一方面,通过了解他们的失败和存在问题,则能更快更好更有效地进行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在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将发挥的作用,是日本和东亚 NIES 所不能相比的。但就连 80 年代东亚 NIES 的繁荣也拆毁了大国美国的产业基础,今后中国的发展,如果出现失误,则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崩溃。然而,日本和东亚 NIES 只是面向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却是在任何场合从不忽视第三世界的动向。从这意义上也可以说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的命运与中国密切相关。为此,这本小书如能起到一点作用,我将感到幸运。

新中国建国 45 周年,作者 54 周岁诞辰

写于横滨妙莲寺寓所

1994 年 10 月 1 日

前 言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冲击刚消失不久，又冒出了一股美国一极控制论及三极结构论等冷战后世界经济论。然而这种冷战后世界经济论缺乏对现存社会主义的反省，缺乏对战后冷战体制的总结与反省，尤其是对我国（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前政治总决算”方面的欠缺作了原封不动的继承。

问题还不能只停留在道义观上，冷战后世界经济论对战后冷战体制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也特别缺乏关心与认识。冷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军事、政治的对抗，而且在展望冷战后的世界时，不能忽视冷战遗留下来的新的结构问题。

冷战的终结，完全不是象许多冷战后世界经济论所误认的那样，说它是向古典市场经济及帝国主义（区域主义）的回归。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都只是几年的战争，但战后都留下剧烈的通货膨胀及经济危机等严重的后遗症。战后冷战时期，美、苏（中）、在近半个世纪内，由于倾注全力竞相开发，其军需生产成了经济结构的轴心，要使这样的经济结构转换的话，几乎要解体原经济结构。

60年代以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冲击为契机，美、苏两大国展开了以核武器与导弹为主的冷战战略武器的开发竞争。在此过程中，美国以军、产、官相结合的形式创出了兼备军事与生产力的研究和开发型产业（军工IB）^①。这也可以说是以量子力学为中心

^① IB：与IA即传统重化学工业相对应的新型重化学工业，即由国家、军事、产业为一体开发研究的航空、宇航、导弹、电子、原子炉等产业。——译者。

的 20 世纪的物理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至于冷战与科学技术革命产物的轴心产业即军工 IB(以下简称 IB),已由南克已氏在论及美国跨国公司向西欧扩展中作了分析^①。

IB 既是冷战体制的形成基础,也是它的解体基础。60 年代后期,美国展开了核武器、导弹的开发,由于参与越南战争及国内反战运动而导致工资上升,又由于垄断企业向海外扩张带来了国内投资的停滞,从而引起经济萧条下的通货膨胀,1969 年向军缓路线的转换,1971 年发生的 78 年来从未有过的外贸收支赤字,引起了 IMF 体制的破裂。这些是冷战体制解体的第一步。然而冷战体制并不是就此崩溃,而是在解体过程中由特有的动力产生新的结构。这结构又进一步促进了解体。

动力之一是由于军缓,IB 中的微电子学(以下简称 ME)向民用转换而带来的 ME 革命。ME 向民用的转换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发生的结构性不景气的对策,成了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共同发起的产业结构转换(ME 化),以及美国与日本的电子工业进入东亚而形成东亚 NIES(即亚洲“四小龙”——译者)的动力。ME 的生产重心向东亚转移的媒介是 1971 年的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因石油危机而急剧膨胀起来的欧洲美元。1979 年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中阐明的 NICS(新兴工业国)的成立,其实也不外乎是欧洲美元向发展中国家还流的产物。以庞大的架空资本为后盾的欧洲美元也是冷战体制解体的又一动力。

如果把冷战体制的解体过程看作冷战的第二个回合的话,那么第二个回合的主力是最早实现了 ME 化的日本以及与日本同样

① 参考南克已著《美国资本主义的战后阶段——若干基础指标》,《土地制度史学》第 43 号,1969 年;《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阶段——战后“冷战”体制的性恪规定》,《土地制度史学》第 47 号,1970 年。

取得快速发展的东亚 NIES (以下简称 NIES)。70 年代后期,日本的 ME 化及 NIES 的兴起引起了一系列世界性产业变革的连锁反应,例如:美国向新自由主义政策转换带来的产业再构筑,EC (欧洲共同体) 统一的决定,苏联的改革等等。但是,美国的产业再构筑及苏联的改革失败,则加速、促进并最终导致了冷战体制的解体。本书将把焦点对准第二个回合展开的基础又是其解体基础的 ME 化及日本、NIES,通过分析,探求其繁荣的原因及结构性特征,并以此阐明其对冷战后世界经济的意义。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如果分析对象是解体过程及其产物的话,那么分析的方法也必须由此决定。解体期往往会呈现出带华丽光环的多种现象,而使原来的价值体系产生混乱。但要分析它是发展还是分解,必须看整体结构。本书将以再生产论及其具体说明作为整体结构的分析视角。对于再生产论,一般认为它是对一国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方法,那么用它来分析已经国际化、高技术化、服务化了的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就会被认为不合适了。这类批评当在预料之中。世界系统论等新理论是以这些事实为依据的,把 NIES 作为“美国——日本——NIES”发展的“三角铃”之一环来分析,也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但是,仅作这样的分析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这样冲淡了对重要的各国内因(结构的特殊性)的分析。现阶段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重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大工业)为生产力基础,以各种资本控制的国民经济为主体的阶段。至于 ME 化、高技术化及国际化(生产重心的转移),是与这种资本控制以及由各种资本控制的国民经济编制相矛盾、相对立的,并将逐步使其解体。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及债务国际化就是一个佐证。

作为再生产论核心的再生产表示论,是价值、剩余价值次元中的总结性理论,包含着世界市场。然而如果要以此来具体分析